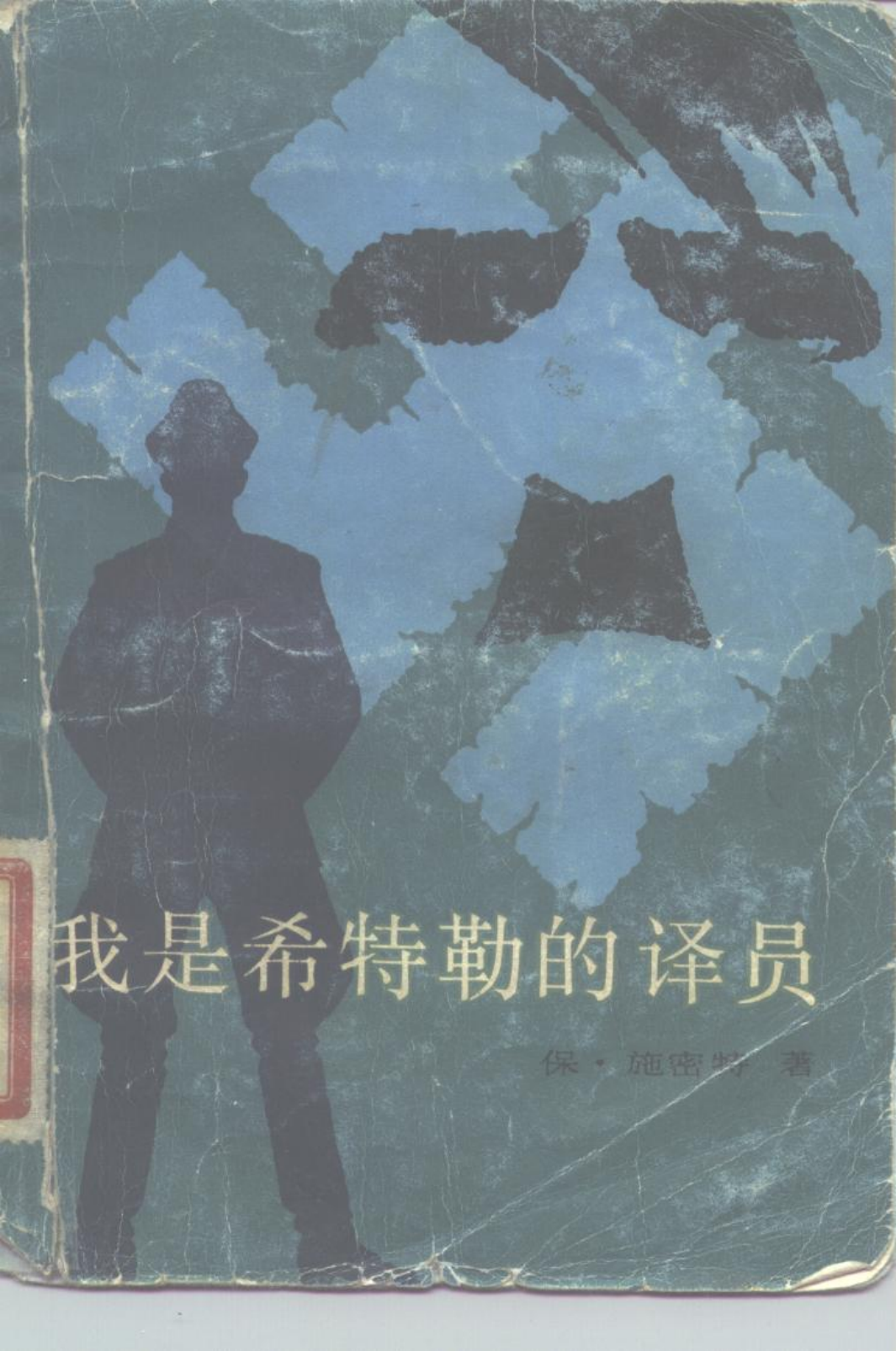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textured background with a large, stylized map of Europe in shades of blue and green. A dark silhouette of a person in a military-style uniform stands on the left side, facing right. The title is printed in large, bold, yellowish-gold Chinese characters across the middle.

我是希特勒的译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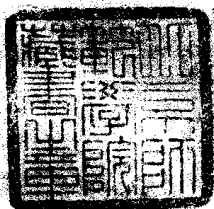
保·施密特 著

K516.44/4

我是希特勒的译员

保·施密特 著 刘同舜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885343

责任编辑 金永华
封面装帧 范一辛

我是希特勒的译员

保·施密特著

刘同舜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浙江湖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8.875 插页2 字数189,000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9,000

书号 11074·533 定价 (六)0.74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保尔·施密特(Paul Schmidt)1923年起入德国外交部担任高级翻译,曾为路德、米勒、布吕宁和巴本等历届德国总理及其外长当过译员。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宣布废除凡尔赛和约中关于德国解除武装的条款后十天,施密特被纳粹党选中充任希特勒与英国外交大臣西蒙会谈的翻译,从此他便成了希特勒的译员,一直到法西斯德国覆灭。

作为译员,施密特出席了希特勒和英、美、法、意、日、苏等国重要政治人物的会谈,耳闻目睹希特勒怎样蓄意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突然进攻波兰从而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大战期间希特勒的对外政策。由于受过专门的职业训练,施密特在《我是希特勒的译员》(Hitler's Interpreter)中对其所参加的历次重要会谈的回忆,大体保持了原始记录的风貌,比较接近实际。当然,在字里行间,有时不免为自己和德国的立场作些婉转的辩解。

关于纳粹德国以及希特勒的著作在国外已大量出版,但译成中文出版的不多。现在流传的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兴亡——纳粹德国史》虽然引用了此书的某些资料,但较为零碎,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例如关于1938年夏秋张伯伦两次

和希特勒会谈及签订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的经过，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勃伦纳山口的几次重要会谈，1940年11月莫洛托夫柏林之行以及希特勒进攻苏联前夕和日本特使松冈的谈话，该书均语焉不详。施密特的回忆还可补充纳粹外交档案之不足。

施密特此书原是他二十年译员生涯的回忆录，篇幅较长，英译本删去前十年的叙述，保留了他后十年的记录，本书根据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51年的版本译出。

目 录

第一章 (1935年)	(1)
第二章 (1936年)	(27)
第三章 (1937年)	(48)
第四章 (1938年)	(68)
第五章 (1939年)	(107)
第六章 (1940年)	(151)
第七章 (1941年)	(202)
第八章 (1942—1943年)	(233)
第九章 (1944—1945年)	(259)
后 记 (1945—1949年)	(275)

第 一 章

(1935 年)

我第一次为希特勒当翻译是1935年3月25日。那天,约翰·西蒙爵士和安东尼·艾登先生来柏林谈判,讨论因德国重新武装而产生的欧洲危机。当时,西蒙是外交大臣,艾登是掌玺大臣。出席谈判的还有德国外交部长冯·牛赖特和当时任裁军问题特别委员的里宾特洛甫。

接到要我出席会议的命令,我很惊讶。虽说我是德国外交部的高级翻译,直至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之前,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差不多为历届德国总理和外长充任译员。但此后情况就变了,德国抛弃了在小范围内坦率地谈判国际问题的外交方式,转而采用递交照会、备忘录和发布公开声明和宣言的方式。

此外,希特勒不喜欢德国外交部以及一切与外交部有关连的人。前几次他和外国人谈话,当翻译的是里宾特洛甫、巴尔杜·冯·席腊赫或其他的国家社会党人。外交部官员们听说希特勒甚至不要国务秘书冯·布劳参加这次与西蒙、艾登举行的极为重要的会谈,不由得瞠目结舌。为了使外交部官员,除部长冯·牛赖特外,至少再有一人参加此次会谈,他们决

定把我推出来当翻译。当希特勒听说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在日内瓦会议工作并干得很出色时，他说：“如果他确在日内瓦工作过，那他一定好不了，不过，我想如今我们可以让他试一试。”

导致这次英德会谈的原因和会谈本身一样，都出人意料。法英两国对德国事态的发展，都十分关切。英国政府对德国的重新武装，尤其对德国空军力量的膨胀，极为不安。1934年7月，鲍德温在下院说：“英国的边界线是在莱茵河。”到了11月，他坦率地承认，德国重新武装必然引起普遍的关切。虽说法国按既定政策，通过缔结一系列的安全条约来保护自己，对付德国，而英国政府还是希望通过会谈来澄清德国的意图。1935年2月3日英法联合公报表示了这一思想。公报说：“大不列颠和法国一致认为，为了重新确立国与国间的信任和保障今后的和平，最重要的是在德国和其它大国之间自由地达成一项普遍解决的办法。”

2月中旬，德国的照会答复了英法主动提出的这一建议。照会说：“德国政府欢迎英王陛下政府和法国政府在其公报中所表现的坦率精神。因此，倘英王陛下政府愿与德国政府交换看法……将是件好事。”当我把照会译成英语时，对希特勒突然装扮成这副和平天使的样子，我不由大吃一惊。

英国政府以最快的速度作好了一切准备工作，遂提出3月初派外交大臣来柏林。然而，发生了另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正当西蒙即将启程赴柏林之际，英国政府为了向议会说明自身重新武装之必要，发表了白皮书。我国外交部翻译组根据英国官方文本译道：“德国不仅无视凡尔赛条约第五部分的规定，公开而大规模地进行重新武装，而且还退出了国联和裁军

会议……陛下政府的行动，当然不能对背弃凡尔赛条约表示宽恕。”白皮书继续说道，倘德国仍以目前速度，毫无约束地重新武装下去，那就会增加德国邻邦的不安从而危及和平。而且，德国人民，尤其是被组织起来的青年人的思想状态，更使人觉得这一无可争辩的日益增长的不安感是有道理的。

国社党报刊火冒三丈。西蒙之行即被推迟，说是希特勒得了感冒。不管怎样，外交部则始终坚持说确有此事，决非外交托词。

事件接踵而来。3月6日，法国实行二年兵役制。3月7日，法国和比利时宣布延长1921年两国签订的军事协定。3月16日，希特勒以下令征兵作为答复。1932年12月谈妥的“国际治安体制”打算给予德国军备平等地位，由于第三帝国在治安体制之外采取了单方面行动，这就成了既成事实。我的外交部的一些朋友们认为，这件事本来可以通过谈判完成得更快、更平稳些，如同撤出莱茵兰和取消赔款一样。依我看，按施特莱塞曼和勃鲁宁这两位政治家主持的谈判做去，可能会更快实现目标，如果这对1933年之前和之后的德国事态发展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的话。本来可以不必付这么大的代价，可惜德国和整个世界当时都不明白。

不到两天之后，英国政府即于3月18日提出了抗议：“对于德国政府3月16日作出宣告征兵的决定以及在和平时期把德国陆军增为三十六个师一事，联合王国陛下政府认为必须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

“这一宣告乃是继宣布成立德国空军之后又一单方面采取行动的证据，撇开是非不论，估计它肯定会严重增加欧洲的不安……”

“英王陛下政府希望得到保证，即德国政府仍然愿意使上次商定的访问得以进行。”

我当时正在外交部翻译组工作，我们立即将这份声明和继后发表的文件译出，送呈希特勒。声明的最后一句，谈到西蒙的访问，确实使我们感到意外，因为我们从未想到，英国人愤愤不已地提出了这一抗议之后，居然接着会彬彬有礼地询问他们可否前来柏林。

当时法国驻柏林的大使法朗索瓦·庞赛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至于我的看法，我当即在3月16日之后提议各大大国立即召回驻德大使，迅速缔结东方和多瑙河公约，组成共同对付德国的防御阵线。英国应表明，目前已无必要举行什么谈判，约翰·西蒙爵士柏林之行的计划也应取消。可是，我的建议被人们认为过激，未予考虑。”

直到3月21日，法朗索瓦·庞赛才向我们递交了法国的抗议。我把它译了出来，交给希特勒。法国的抗议说道：“这一系列的决定（下令征兵，陆军增编为三十六个师，建立一支德国空军）显然与德国签署的条约所承担的义务相冲突。而且，也与1932年12月11日的声明（国际治安体制内军备平等地位）相冲突。……德国政府蓄意违犯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有责任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保留今后一切权利。”

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未来的盟邦意大利人出场了。意大利大使递交的照会，只提到保留今后行动的一切权利。我们赶快把这份照会译了出来。意大利大使递交的照会最后一句话是，意大利政府不能承认因“单方面的决定即宣告国际协定无效”而造成的事实。只要稍为比较一下这三份照会，我就

知道，对德国的包围已开始松动。联合阵线显然出现了裂痕。两天之后，在德国总理府，我带着这一想法，坐在希特勒和西蒙之间充当翻译。

3月25日早上，希特勒在他前任勃鲁宁扩建完工的办公室里心情愉快地欢迎牛赖特和我本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希特勒，因为我从未参加过他出席的公开会议。发现他只不过是中等身材，我很惊讶——照片和银幕上的希特勒要比本人显得高大些。

约翰·西蒙爵士和安东尼·艾登被请入办公室。尽管有最近的抗议和“单方面的行动已严重增加了国外的关切”等警告，彼此还是面带笑容，亲切握手。希特勒的笑容尤为亲切，因为英国客人来到柏林就是他的一大胜利。

“我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已把德国从而也许把整个欧洲，从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中拯救了出来……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们吃尽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苦头……如果我们搞起他们所关心的军备的话，那也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目的是对付这些布尔什维克党人。”他讲话时，有时也动感情，但比起我所听说的、他在其它国际会谈中更为冲动的表现，那就算不了什么了。

他善于用普通的词汇讲话，表达得很清楚，很机敏，他对自己的论点很有把握，也很容易听懂，不难译成英语。他说话时显得胸有成竹。他桌子上堆了一批刚写好的材料，但在整个会谈中却从未使用过。他也不带笔记本。

我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有时，当他停下来想一想应该讲什么时，我就有机会停一下做记录，注视着他。他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那目光似乎要穿透他讲话的对象。讨论展开之后，

他就逐渐不断朝我说话。在我翻译时，我常常发现讲话人的本能总是朝懂他话的人说话的。不过，就希特勒来说，我感到他虽朝着我说话，其实并不在看我。他正忙于思考，根本无暇顾及周围一切。当他谈到一个特别重要问题时，脸部表情就显露了；当说到布尔什维主义对欧洲的危险时，鼻孔也会颤动起来。为了加强语气，他举起右手做个急切有力的手势，有时会握紧拳头。

希特勒这次给人的印象，根本不是我原先想象那样是个激烈的煽动家。那天早上以及这次和英国人的整个会谈中，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个深知此类政治谈判一切惯例的人，能机智灵活地提出论据，好象他过去一直是这个模样。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讲话冗长不堪。那天早上的会谈，差不多都是他一个人在那儿讲，西蒙和艾登只偶而插上一句或提出个把问题。随后，希特勒似乎有点觉得他们两位的兴趣在慢慢减退下去，他们当然也不完全听得懂他的讲话。于是，每隔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他就停下来，让我翻译。

长着一双褐色大眼睛的西蒙，跟希特勒用心听他讲话一样，也全神贯注地听希特勒讲话。他脸上很自然地露出一种慈父般的神色。这个我在日内瓦就注意到了，当时，他以英国律师那种精确无误的措词，抑扬顿挫地陈述英国的观点，显然有点过分追求形式。现在当我看到他聚精会神地听希特勒讲话时，我感到他那慈父般的谅解神色显得更加浓重。也许他不无惊奇地发现，与英国报刊对纳粹的渲染完全不同，这个人容易激动，语气强硬，但并非不讲道理或心地不正。在后来几年中，外国客人几乎非常热情地跟我说起希特勒给他们的印象，我往往就想到这大概是某种过份的反希特勒宣传的结

果吧。

另一方面，我偶而看到艾登脸上掠过一丝猜疑的神色，他的德语程度多少可以听懂希特勒的话。艾登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意见，表明他相当怀疑希特勒嘴上说的一套。一次他说，“没有确实的根据可以说俄国有侵略德国的计划”，他稍带讥刺地问道：“使你们恐惧的实际根据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我要比住在英伦岛的你们英国人有更多的切身体会”，希特勒不正面回答艾登的问题。接着他抬起下巴，激动地说：“我是在布尔什维克向德国发动第一次攻击时开始我政治生涯的。”然后，他又长篇大论地谈起布尔什维克党人，从个别说到一般，这段独白包括翻译在内，持续到吃午饭。

第一次会谈从上午十点一刻谈到下午二点，气氛很是融洽，至少希特勒是这样看的。离开办公室时，他对一位客人说，“我们之间有了很好的接触”。他回过来握着我的手说：“你干得很出色，我从未想到翻译工作能做到这个地步。过去，为了让人翻译，我说完一句，非得停一下才行。”

“你今天翻译得很好”，艾登在大厅里碰见我时说道；在日内瓦许多次棘手的会议上，我和艾登彼此就认识了。

英国客人和牛赖特共进午餐。之后，继续会谈。德国一方的牛赖特和里宾特洛甫没有开口。西蒙非常平和而友善地首先发言，对德国单方面破坏凡尔赛和约提出了英国方面的保留意见，艾登则重新谈到德国所担心的俄国有侵略意图这一问题。他说：“在这方面，缔结一项东方公约是很有好处的。”这样，他就提出了下午会谈的上半场主题。他简要地说明了这项公约的性质。他说，公约的参加国可以是德国、波兰、苏

俄、捷克斯洛伐克、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他说，一旦缔约国一方受到另一方的侵略，缔约国应承担相互支援的义务。

当艾登提到立陶宛时，希特勒第一次发火了。“我们和立陶宛没有什么可谈的”，他高声喊叫起来，目光炯炯，顿时好象变了另一个人。往后，我将经常看到他这种突然发火的样子。他可以不要任何过渡，就会突然发起火来，嗓门变得嘶哑，卷舌音也就更多，瞪出两眼，紧握拳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决不和一个对默默尔的德国少数民族大加歧视的国家缔结什么公约”，他叫喊道。随后，刚开始的这场风暴，却突然停了下来。希特勒又恢复到就立陶宛问题争论之前的模样，一个平和而干练的谈判家。他解释了他为什么要激动，说就在几个月前，默默尔的科夫诺军事法庭以阴谋颠覆罪起诉了一百二十六名公民，这件案子快审判完毕。

希特勒以更加平和的口气，用更有力的理由拒绝缔结东方公约。他强调说：“国家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根本谈不上联合。”然后，他又激动地说：“有数百名我党内同志被布尔什维克人杀害了。德国士兵和平民正在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崛起而进行战斗。布尔什维克和我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无法共同缔结什么公约和协定。”此外，缔结东方公约还有三个障碍，这就是德国有正当理由不能信任一切集体条约，因为“这些条约不能制止战争，只会鼓励战争并促使其扩大”。双边条约倒是可取的，德国愿和她的所有邻国缔结这类互不侵略公约。“当然不包括立陶宛”，他激动地说道，接着又非常平和地加上一句，“除非默默尔问题得到解决”。

艾登再说到东方公约，他问，能不能把互不侵犯公约或双

边互助协定结合起来，作为东方公约的一种体制。但希特勒又拒绝了这一建议，说不能在一个普通的协定体制内容纳两种不同集团的成员国组织。而且他还根本反对互助协定这类想法。有意思的是，他另外提议，各个国家应当把自己的义务限于不帮助侵略国。“这可以使战争局部化，而不致于普遍化”，他非常合乎逻辑地说道——这是一个准备各个击破对手的人的逻辑，他不希望有人阻碍他前进。不过，当时他论点背后的动机还看不清楚，他往后的行动才暴露出这种意图。

西蒙提出了几个机灵的问题，把话题从东方公约转到对付干涉多瑙河国家内政的多瑙河公约。该项建议以法国提出的计划为基础，目标是防止德奥合并，缔结一系列条约作为屏障，不使德国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巴尔干。我在外交部曾听说希特勒特别反对这一想法，理由当然很清楚，因此，我等待着他对这位英国客人说“不”。但使我惊讶的是他没有这么说。“从根本上说，德国并不反对这种公约”，我听他这么说，似乎他有点同意了。不管如何，我竖起耳朵注意听“从根本上说”这个词。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当一位代表说他原则上同意，人们就知道他实际上反对这一提议。希特勒是否也在玩弄这种国际会议上的老花招？他紧接着说的话证实了我的想法。他似乎漫不经心地说，“不过，应该弄明白，所谓不干涉多瑙河国家事务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当我译完这句话时，西蒙和艾登彼此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我突然感到我好象又回到了日内瓦会议。

那天下午，英国客人也提到了国联问题。“要最终解决欧洲问题”，西蒙平静而明确地说，“倘使德国仍不是国联的一个成员国，那是不可设想的。德国如果不回到国联，欧洲各国之

间就无法恢复信任。”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也不象我想象的那么毫不妥协。他说，德国重新加入国联，当然是有可能的。国联的原则毫无问题值得赞扬，但迄今为止，其所作所为证明德国人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的。德国只能以一个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成员重新参加国联，然而，凡尔赛和约却和国联宪章连在一块了，这事就不好办。“其次，如果真的承认我们德国是个享有平等权利的大国，似乎也应该在殖民地委任统治方面有我们的份”。他说得很快，然而接着又立刻表示德国现在并不打算提出殖民地方面的要求，从而没有就殖民地问题进一步讨论下去。

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下午七时，一半时间自然花在我的翻译上，而希特勒，他习惯上总是翻来复去地讲他感受强烈的问题。由于没有会议主持人和议程，会谈也就进行得松散。不过，总的说来，比我最初预料的要好，虽说比起上午的那种融洽气氛，我觉得在下午会议上英国客人似乎冷淡了一点，这当然是因为希特勒尽管在德国重新参加国联问题上表现友好，颇有分寸，但实际上却拒绝了各个建议。

冯·牛赖特为英国客人来访举行了宴会，参加的有八十余人，包括希特勒，德国所有部长，许多国务秘书和纳粹党著名人士。英国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和使馆高级官员也出席作陪。

我紧挨希特勒坐下，从头至尾为他翻译，美菜佳肴一道道上来，我却无暇尝上一口，以致散席时饿得够呛。当时还没有一边吃饭一边翻译的方式——发言者放下刀叉发言时我吃，我翻译时他吃。这种形式后来为礼宾司司长所承认，作为在宴会上解决译员吃饭问题的一个独创。

第二天上午的会谈集中讨论德国军备问题。当西蒙再次阐述英国所持立场的原则，尤其是在谈到德国军备水平而没有表示英国放弃她原有立场时，西蒙和希特勒之间曾出现过一点紧张。英国严格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凡尔赛和约只能通过相互商讨取得一致意见，而不能用单方面破坏的办法加以更改。

希特勒则以其众所周知的论点予以反驳。他说，第一个破坏凡尔赛和约军备条款的，不是德国，而是其它大国，因为它们并没有明确表示承担裁减军备的义务。他接着笑着说：“当勃吕彻尔出兵援助英国时，威灵顿有没有首先询问过他外交部专家：普鲁士部队的实力是否和现存条约相一致？”

双方说了各自的看法，语调一点也不尖刻，英国人显然竭力避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出现不幸的意外事。给我的印象是，西蒙在表达英国的保留意见时，那种小心翼翼的样子，几乎是在恳求希特勒不要反对；而希特勒的口气，比起他就裁军问题发表的公开讲话来，也是温和得多，不过，话还是说得相当清楚的。“我们不会让别人对下令征兵一事说三道四”，他说，“但打算就军队实力问题进行谈判。我们的唯一条件是要和拥有最强大武装的邻国，在陆军和空军方面拥有同等的地位。”

西蒙问他，按目前盛行的看法，他估计德国需要拥有多大的军备实力？希特勒答道：“如果有三十六个师，也就是说有一支五十万人的陆军就可以了。”不过，假如再加上一师冲锋队和武装警察，那他就一切心满意足。希特勒提到冲锋队时，矢口否认纳粹党组织本身具有什么军事性质，和海德里奇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的论调如出一辙，这就有点尴尬了。艾登